

# 論汲冢竹書出世在中古學界造成的影響

張 蓓 蓓\*

## 提 要

西晉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發現了戰國魏王遺塚，得古竹書數十車，成為西晉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當世學人荀勗、和嶠、束皙、杜預、衛恒、王庭堅、王接、摯虞、謝衡、續咸、傅瓚、張宙、干寶、張華、司馬彪、徐廣、樂資、郭璞等人先後投入竹書的研究，在學界引發了重重的波瀾，留下或明或暗的印痕與影響。竹書雖經整理為十五書、十九雜篇，事實上「差為整頓」的只有《紀年》、《瑣語》、《穆天子傳》三種而已。本文就以此三書為目，探測三書在當世學界的「接受」。

古本《紀年》在當世先是引生了對上古史的一連串檢討，如舜放堯、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等，又引生了對古代史地內容細節的大量考察補正，又因編年為「古史記之正法」，遂引起編年體之復興。《瑣語》是「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乃雜史而近小說者，遂成為古代怪異預言總集，直接影響《搜神記》、《神異記》、《博物志》等書的內容，並與志怪小說之興盛有不可切斷的關係。《穆天子傳》託為周穆王西征遊行紀事，當時以為史實，又因彼此內容之相滲，重新引起時人對《山海經》的注意。郭璞既注《穆天子傳》，

---

本文於 104.06.29 收稿，104.10.15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DOI:10.6281/NTUCL.2015.10.50.01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又注《山海經》，又與《紀年》、《爾雅》等彼此附會，構成一整套神話傳說知識系統，往下影響了《列子·周穆王》篇的偽成、古小說《漢武帝內傳》的主題，甚至促成晉僧法顯西遊記《法顯傳》的撰造。

**關鍵詞：**汲冢書、竹書紀年、汲冢瑣語、穆天子傳、志怪小說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 The Impact of the Discovery of Ji Mound Bamboo Books o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the Mid-Antiquity E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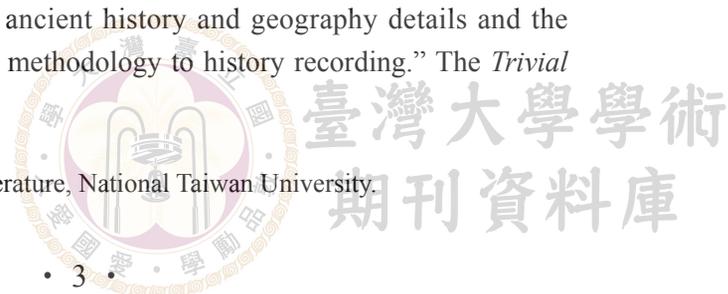
Chang Pei-Pei\*

## Abstract

In 281 A.D. when Emperor Wu reigned the West Jin dynasty, dozens of cartloads of ancient bamboo slip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burial mound of King of Wei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was a major event in West Jin academic history. Xun Xu, He Jiao, Shu Xi, Du Yu, Wei Heng, Wang Ting-Jian, Wang Jie, Zhi Yu, Xie Heng, Xu Xian, Fu Zan, Zhang Zhou, Gan Bao, Zhang Hua, Si-Ma Biao, Xu Guang, Yue Zi, Guo Pu, and other scholars all plunged into the study of the bamboo slip texts. The efforts brought about waves of discussions and influenced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 texts were sorted into 15 books and 19 miscellaneous articles, but only the three books are in better order: the *Bamboo Annals*, the *Trivial Talks*, and the *Tale of King Mu*.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m to investigate how they influenced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circles. The ancient text of the *Bamboo Annals* stirred up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Shun exiling Yao, Qi slaying Yi, Tai-Jia slaying Yi-Yin, and Wen-Ding slaying Ji-Li. It also triggered investigations and verifications of ancient history and geography details and the revival of the annals as “the proper methodology to history recording.” The *Trivial*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lks* is “a monster dream divination book of the states” mixed with history and similar to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It serves as a collection of ancient strange prophetic words that influenced later works such as the *Records of Searching for Spirits*, the *Records of Anomalies*, the *Records of All Things*, and directly led to the flourishing of many tales of the strange. The *Tale of King Mu* was believed to be a true historical account of Emperor Mu of Zhou’s westward incursion and exploration and thus arous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lated work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Guo Pu not only annotated both the *Tale of King Mu* and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drew links between them and the *Bamboo Annals* and the *Er-Ya*, thereby forming a complete knowledge system of myths and legends. The system resulted in the fabrication of “King Mu of Zhou” of the *Liezi*, became the theme of the ancient novel *Anecdote of Emperor Wu of Ha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fake *Biography of Fa-Xian* about the Jin monk Fa-Xian’s purported adventures.

**Keywords:** Ji Mound bamboo books, *Bamboo Annals*, Ji Mound Trivial Talks, *Tale of King Mu*, tales of the strange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 論汲冢竹書出世在中古學界造成的影響

張 蓓 蓓

## 一、緒 言

西晉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偶然發現了戰國魏王遺冢，<sup>1</sup>得古竹書數十車，成為西晉學術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史籍敘述此一大發現雖有若干錯亂處：如《晉書·武帝紀》云是咸寧五年（279）事、《晉書·衛恒傳》云是太康元年（280）事、《晉書·束皙傳》云是太康二年（281）事；又如〈武帝紀〉云用小篆書、〈束皙傳〉云用科斗字、〈續咸傳〉云用古文；又如墓主當時已有異論，故《晉書·束皙傳》並列魏襄王、魏安釐王二說；然而這一大批竹簡書揭示了戰國中後期三晉地區特殊的學術遺存，足以考見其學術特色與學術水平，<sup>2</sup>則是不爭的事實。故王國維先生曾在一次演講中指出：「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最大的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漢晉木簡、……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sup>3</sup>

<sup>1</sup> 太康十年汲縣令盧無忌所立《晉太公碑》述此甚詳，云：「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云云。今見收於宋·趙明誠：《金石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卷20。

<sup>2</sup> 民國五十年代，衛挺生作《穆天子傳今攷》，即謂梁丘藏之竹書多為駢衍所遺，富有駢學色彩。見衛挺生：《穆天子傳今攷·自序》（臺北：中華學術院，1970年），頁15-19。近年樊榮教授亦提倡研究「汲冢學」的外延與內涵，以作為黃河文明研究之一主軸，見樊榮：〈汲冢學在黃河文明繼承創新中的地位〉，《殷都學刊》2012年第4期，頁62-64。

<sup>3</sup> 此講名為〈最近二三十年間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載於1925年之《學衡》、《清華周刊》、1926年之《科學》雜誌中。

可惜限於昔時的觀念與傳播條件，這些古籍的結局常是入藏秘府，僅供少數學者專家研究，最後往往不免再度佚失的命運。

雖然如此，這一重大的發現確曾在西晉以下數十百年間發生了不少的影響。尤其《竹書紀年》的考史價值與《穆天子傳》的史地小說價值，長期以來仍為學界所艷稱。本文不擬重探這些東西價值的高低，倒是意圖鉤稽若干雜史料，嘗試測度汲冢發現在當時的學界中究竟發生了何等波瀾，引生了哪些影響，留下了哪些或明或暗的痕迹。或許這將有助於了解當代學風的某些盛衰起伏。由於文獻不足，本文的若干推論可能合情合理而乏直接證據，讀者諒之。

為便說明，在此先依《晉書·束皙傳》所敘，抄列出汲冢竹書的全部清單：

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中略）……。

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

《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

《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

《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

《國語》三篇，言楚晉事。

《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

《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

《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

《繳書》二篇，論弋射法。

《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

《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

《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

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

盛姬死事》。<sup>4</sup>

大略看來，這些古書包括別本《易經》、《易傳》、論易之語、類似《禮記》、《爾雅》之書、類似《國語》、《周書》之書、摘引《左傳》卜筮之書，還有編年的魏國史書，記載特定故事的奇異之書，以及談天論曆之書、談論食田、弋射之法之書等等。其中顯有古代學術的積澱，有晉楚文化的色彩，也有些獨特的學術興味。可惜因於文獻的殘缺，<sup>5</sup> 識字的困難，<sup>6</sup> 大部分文獻即使初步整理後入藏秘府，也還是糊塗含混，無以應用。束皙博學多聞，通科斗書，在著作之職，隨疑證釋，頗多勝見。前引這些簡略的說明，或許即是他辨讀的成果，故附載在《晉書》他的本傳之中。

書出未久，依當代人的說法，比較明白可讀的書唯四，見王隱《晉書·束皙傳》：

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此四部差為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于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sup>7</sup>

孔穎達所錄的這段王隱《晉書》固甚可貴，然中間尚有不少字句，依衛挺生先生之見乃孔氏所添加，非王隱原有；<sup>8</sup> 例如「漆字科斗之文」句下原有「科斗

<sup>4</sup> 見唐·房玄齡等修，清·吳士鑑、劉承幹注：《晉書輯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卷51，頁1432-1433。

<sup>5</sup> 仍見《晉書·束皙傳》，云：「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

<sup>6</sup> 見《春秋經傳集解·後序》：「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晉·杜預撰：《春秋經傳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sup>7</sup> 王隱書早佚，此文為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所錄，置於杜預〈後序〉之最末。

<sup>8</sup> 其意得自朱希祖《汲冢書考》。見衛挺生：《穆天子傳今攷》，同註2，第三章第四目，頁97-99。筆者推尋其意，復改訂末句。按，清·湯球輯王隱《晉書》，亦未錄此等字句，蓋《玉海》引錄已用小字夾注，不視為正文。

文者，周時古文也」，「大凡七十五卷」句下原有「《晉書》有其目錄」，「《周王游行》五卷」句下原有「說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句下之原有「《穆天子傳》世間偏多」，均屬孔氏補充說明之語，今已逕行除去。則王隱指出「差為整頓」的四書就是《周易》、《紀年》、《瑣語》、《周王游行》了。<sup>9</sup>若依曾真正親見竹書的杜預的說法，則所有竹書中比較明確易了的書唯二，見其《春秋經傳集解·後序》：

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

顯然《瑣語》及《穆天子傳》在杜預看來也屬「雜碎」「怪妄」，不值深究，唯《周易》及《紀年》較有可觀。他對汲冢《周易》的描述是：

《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

然則此一《周易》甚至不如今本之備。這事實上是《易傳》晚出、不出孔子的明證，並非《易傳》尚未傳來魏國。即使另有一繇辭不全同之別本《易繇陰陽卦》存在，他也不覺有特別注目的必要。至於《紀年》，杜預的評價就遠為高崇了，詳下文。

如此說來，汲冢竹書之中，較為完整且能引生若干波瀾和學術影響的書，應該只有《紀年》、《瑣語》、《穆天子傳》三者了。杜預自稱有「《左傳》癖」，<sup>10</sup>以發揚《左傳》、排抑《公》、《穀》為己志；前述《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之中，他曾以戰國汲冢所藏、摘引《左傳》卜筮故事的《師春》為例，謂《師春》：「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以此證明《左傳》之早出戰國而可信。可知即使在文獻價值上無所突破的《師春》一書，也不無某種撼動當世學風的力量。故若謂上述三書的出現在當代學術史上並無什麼影響，則吾

<sup>9</sup> 《紀年》，王隱書作十二卷，今《晉書》作十三卷。清·吳士鑾《晉書斟注》云當作十二卷，與《隋志》著錄合，且與七十五卷之總數合。《周王游行》即《穆天子傳》，二書均作五卷，今世傳本則有六卷，蓋合《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而成。

<sup>10</sup> 見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1年），〈術解〉注引《語林》。

不信。以下即以此三書為對象，次第探測當時學界對此三書的接受。

## 二、《紀年》出世對古史知識及流行史體的影響

先論《紀年》。《紀年》當為魏國之編年史，記事似乎始自夏、商、周三代，直至「今王」之二十年。上述〈束傳〉、〈杜序〉皆云然。然今所見遺文中赫然仍有一些三代以前、涉及五帝的記載，究屬偶然涉及還是自成篇幅，在當時即已引起爭議。「今王」屬誰，長期以來亦有不同說法。劉宋·裴駙《史記·魏世家·集解》嘗引荀勖、和嶠之說云：

荀勖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並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sup>11</sup>

此段文字，方詩銘先生據朱希祖先生《汲冢書考》之推論，認為是當初荀勖領銜所上的〈紀年序錄〉之一段，<sup>12</sup>甚是。特標「和嶠云」，當是和嶠認為《紀年》起自黃帝的見解與荀勖三代說不同，故荀勖特予保留以資考索。而「今王」屬誰，由於《紀年》的記載與《史記》、《世本》皆不一致，故荀勖亦作了一些考證。荀勖以《紀年》所載惠成王年世為是，故說「今王」是魏襄王。<sup>13</sup>同時杜預則以《史記》為是，故說「今王」是魏哀王。仍見〈杜序〉：

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編年相次。

<sup>11</sup> 見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魏世家〉，卷44，頁1849。

<sup>12</sup> 參見方詩銘：〈古本竹書紀年輯證〉，《東岳論叢》1980年第4期，頁109。

<sup>13</sup> 荀勖等五人結銜之〈上穆天子傳序〉亦云：「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見諸本卷首。

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

二說其實年次並無差異。<sup>14</sup> 倒是〈束傳〉另說以「安釐王」代指「今王」，年次是有問題的。<sup>15</sup>

這一出自汲冢的《紀年》，或可謂《古竹書紀年》，雖在兩宋以下逐漸散佚，然而其豐實的歷史記載仍然帶給當代人極大的震撼。語其新異，如〈束傳〉云：

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當作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語其參校之功，則〈杜序〉云：

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

要之，其書在考正典籍、補充歷史內容細節上可有甚多應用，至今仍可一一搜剔。譬如「夏年多殷」事，與古來一般概念不符；唯今所見《汲冢紀年》遺文並不如此；<sup>16</sup>「然《晉書》必有所據」，<sup>17</sup>「疑今所見《紀年》夏殷年數，為和嶠、荀勗所釋，故與束皙之語不合。」<sup>18</sup> 無論如何，這些記載總可為文獻嚴重缺乏

<sup>14</sup>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系本》襄王生昭王，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同註 11，頁 1849。

<sup>15</sup> 清·吳士鑿《晉書斟注》云：「《竹書紀年》斷限於哀王二十年，而所藏則在襄王之冢，其時襄王已葬，哀王在位，故稱哀王曰今王。……云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又誤以哀王為安釐王，更遲四十三年矣，其去燔書之歲安得有八十六年乎！」見臺灣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本，卷 51，頁 977。

<sup>16</sup> 南朝宋·裴駟《史記集解》於〈夏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於〈殷本紀〉又引《汲冢紀年》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sup>17</sup> 清·吳士鑿語，見《晉書斟注》。同註 15，頁 977。

<sup>18</sup> 方詩銘語，見《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41。

的上古史提供許多參據。又如「益干啟位，啟殺之」，亦與《孟子》、《史記》所云不同，<sup>19</sup>然屈原《天問》確有「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之語，《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與《國策·燕策》一也確有「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之語，可見戰國時確另有如此的傳聞。又如「太甲殺伊尹」，亦同上條，《孟子》與《史記》及《偽古文尚書·太甲》皆言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太甲悔過，乃迎之復位；<sup>20</sup>而《紀年》則明確指稱伊尹自立，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顯然儒家典籍多取美化的正面傳說，而《紀年》則否。至於周厲王末年所謂周公、召公二相共和事，《紀年》則謂「共伯和干王位」，乃一人攝位，非二相共和；此在戰國晚期亦有完整的傳說故事以為支持，如《呂氏春秋·開春》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稽遲）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謂為天子）矣。」又《魯連子》亦詳述共伯和行天子事，已而復奉宣王云云。《莊子·讓王》有云：「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則以共伯和為讓王不居的代表人物之一。<sup>21</sup>凡此均可見王位的爭與讓在古代確為重大的事故，傳說或記載皆甚紛紜，而周、召二公共治號為「共和」的說法則難以成說。不過，《紀年》新說雖然引生了不小的震撼，受到傳統典籍影響，先入為主而疑《紀年》的學者在斯時應該還是居大多數，此可以借唐·劉知幾《史通·疑古》的說法為證：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

<sup>19</sup> 《孟子·萬章上》：「舜薦益于天，……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啟興，能敬承繼禹之道。……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又《史記·夏本紀》「帝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sup>20</sup> 仍見《孟子·萬章上》。又《史記·殷本紀》。

<sup>21</sup> 《魯連子》，〈隋志〉子部著錄五卷，在《新語》前。唐·張守節引文甚詳，見《史記正義·周本紀》，卷4，頁144。《莊子》文義似乎稱道共伯能讓，《釋文》引司馬彪注《莊子·讓王》，則有「共伯和干王位」語，顯已受《紀年》之說影響，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別詳下文。

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sup>22</sup>

劉知幾自己則是中古時代最勇於疑古的人，故他個人還是偏向相信《汲冢書》，而云：「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這些議論也使他自己被後儒撻伐至今。

以上主要是就《紀年》諸新異記事在當時引起的波瀾稍加猜測討論。其他小小出入足供考史者參正的地方尚有不少。且舉西晉·司馬彪之事為例：

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sup>23</sup>

譙周蜀亡入晉。作《古史考》，見於《三國志·蜀書·譙周傳》。據此文及《史通·模擬篇》，<sup>24</sup>可知譙周戈矛所向正在史遷，而司馬彪則據《紀年》等新出土文獻復獻一百二十二疑。則《紀年》的參考價值豈不可想！前舉《莊子·讓王》提及「共伯」，司馬彪注云：「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干王位。」<sup>25</sup>云云。此無疑就是運用《紀年》新說的一端了。彪著有《續漢書》，卒於惠帝末年，上距汲冢出土僅二十餘年。

除了司馬彪，其他晉世學者的著作中往往亦能見出《紀年》加諸他們的影響，尤以史家史著最為顯著。例如注解《漢書》知名的「臣瓚」，唐·顏師古注繁引其說，師古〈漢書敘例〉云：

<sup>22</sup> 見《史通》外篇〈疑古〉第三，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93年）。此文稱《汲冢書》，當是《紀年》。然〈疑古〉篇前文引「舜放堯於平陽」事，稱《汲冢瑣語》。疑二書俱有此事。

<sup>23</sup> 見《晉書·司馬彪傳》，卷82，頁2142。

<sup>24</sup> 《史通》內篇，〈模擬〉第廿八，云：「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倣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外篇〈古今正史〉第二亦及此事，稱「晉散騎常侍譙周」。

<sup>25</sup> 彪注不存，今見《經典釋文》卷28引。

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sup>26</sup>

此「臣瓚」或許即是太康初與荀勖、和嶠聯名奏上《穆天子傳》的傅瓚，<sup>27</sup>而非北魏·酈道元所以為的薛瓚，<sup>28</sup>則其「喜引《竹書》」便易理解。《竹書紀年》提供了不少古代都邑地名方位，臣瓚常引以注《漢書·地理志》。例如潁川郡之陽翟，應劭以為是夏禹之都，臣瓚則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又北海郡之平壽，應劭以為即故埆尋也。臣瓚曰：「埆尋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埆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又右扶風之柁邑，臣瓚亦以為地望不確，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黠，是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sup>29</sup>所言都甚合理可從。

後來的史地之書循此故徑，也常借《紀年》資料為述論之資，如劉宋·范曄《後漢書》〈西羌傳〉與〈東夷傳〉的敘述中疑皆暗用《竹書紀年》，例如〈西羌傳〉：「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唐·李賢注則予點明：「《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又「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李賢注亦言：「《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又〈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李賢注亦言：「《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

<sup>26</sup> 文見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首。

<sup>27</sup> 舊抄本《穆天子傳》卷首〈上穆天子傳序〉前有結銜五行，敘共校第錄之五人，中有秘書校書郎中傅瓚。以「臣瓚」為此傅瓚者，有唐李善、司馬貞等。詳見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1，「成公子安嘯賦」條。

<sup>28</sup> 酈道元以為薛瓚，梁·劉孝標《異苑》又以為于瓚。清·臧庸謂：臣瓚引書有《祿秩令》及《茂陵書》，皆已亡於西晉，舍傅瓚其誰見之。又謂：以為薛瓚，更無佐證。詳見清·臧庸撰：《拜經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卷5，「臣瓚」條。

<sup>29</sup> 諸例皆見《漢書·地理志》，卷28上。

來賓也。」<sup>30</sup>由此甚可想見《紀年》所述上古史地的特殊價值。

至於北魏·酈道元注《水經》，繁引《竹書紀年》證地，達數十百條之多，更成為保存《古本竹書紀年》的重要功臣。例多不遑再舉。

另外，東晉末受命作《晉紀》的徐廣，也以注解《史記》知名，有《史記音義》。劉宋·裴駟謂：

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

唐·司馬貞亦謂：

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sup>31</sup>

事實上裴駟《集解》繁引其說達兩千條。《音義》作注多引《世本》、史遷〈六國年表〉、皇甫謐《帝王世紀》互相證明，也不乏引《紀年》者，例如卷四十三〈趙世家〉「反高平、根柔於魏」句下，《集解》引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河陽曰河雍、向曰高平也。」又如卷四十五〈韓世家〉「於是楚解雍氏圍」句下，《集解》引徐廣曰：「《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sup>32</sup>凡此皆有補益資料之功。嗣後裴駟自己的《集解》以及唐人司馬貞、張守節的《索隱》、《正義》也都常引《紀年》討較史事。

不止此也，《史通·六家》曾言及：

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

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採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合成三十卷。<sup>33</sup>

此樂資《晉書》不載，此《春秋後傳》亦已不傳，僅有他的《山陽公載記》仍見於世；但樂資曾為晉著作郎，亦曾據《紀年》以參補其史著，例如《史記·衛世家》「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句下，司馬貞《索隱》曰：「樂資據《紀

<sup>30</sup> 前二例見〈西羌傳〉，卷 87。後例見〈東夷傳〉，卷 85。

<sup>31</sup> 上引原文皆收於宋·高似孫：《史略》（臺北：廣文書局，1991 年），卷 1，「諸儒史議」。

<sup>32</sup> 前例見〈趙世家〉卷 43。後例見〈韓世家〉，卷 45。

<sup>33</sup> 見《史通》內篇〈六家〉第一。



年》，以嗣君為孝襄侯。」<sup>34</sup> 總之，自汲冢《紀年》諸書出土面世以後，史家得此利器，在史學撰述上平添了許多新見創解，至今猶留與後人受用。<sup>35</sup>

若論汲冢《紀年》出世在當時學術界的影響，恐怕最大的影響還非在內容的添補上，而是在形式的師法上。換言之，也就是促成了《左傳》的獨秀及編年史的復興。最早提倡此一意識的當然仍是杜預，其《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明言：

其《紀年》，……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sup>36</sup>「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於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sup>37</sup> 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者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

兩相對比，正見《左傳》不惟記事詳盡，即論義法，亦簡明可信。則《左傳》在杜預鼓吹下大盛於魏晉是甚易想像的了。《史通·申左》對此已有清楚的表述。干寶在東晉初承王導之薦任修史，其〈史議〉即大肆鼓吹編年之體，見《史通·煩省》引：

及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sup>38</sup>

<sup>34</sup> 見《史記·衛康叔世家》，卷37，頁1604。

<sup>35</sup> 洪國樑先生有〈竹書紀年對兩晉南北朝學者之影響〉一文，論述簡明可參。見韓國《中國學報》第30輯（1990年7月），頁17-24。

<sup>36</sup> 此八字為《春秋》經文，原無，疑佚，今酌補以明文意。以下引號內為《左傳》文。三例皆以經、傳連書。

<sup>37</sup> 《紀年》原文外，《春秋》經、傳云云，分見隱公元年、僖公三年、僖公二十八年。

<sup>38</sup> 見《史通》，內篇，第三十三。

無怪干寶所作《晉紀》二十卷即是編年，為時所稱。干寶在紀傳、編年二體之間取舍顯然，屢見劉知幾之書，<sup>39</sup>而劉知幾自己顯然也頗認同干寶。<sup>40</sup>他甚至稱道「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遂使「史例中興，於斯為盛」。<sup>41</sup>又說「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為師範」，此後「其書漸行，物無異議」。<sup>42</sup>這裡已看到了編年興盛的明確迹象。推其原始，自然《紀年》的出世是主要的因由。故《隋書·經籍志》已言：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至晉太康元年，汲冢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sup>43</sup>

於是在「古史正法」的觀念推動下，編年體的興盛遂勢不可擋，一直要到北魏孝文帝時始重倡「今體」。<sup>44</sup>說來這才算是汲冢文獻在學界所造成的最大洪波罷！

### 三、《瑣語》出世與志怪興盛的關係

接著再論《瑣語》出世的影響。《瑣語》就其書名看來，應當是瑣小語事之意，或者說近似於東漢桓譚論小說家時所說的「叢殘小語」。<sup>45</sup>考察今日所

<sup>39</sup> 如《史通·二體》亦云：「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內篇，第二。

<sup>40</sup> 《史通·載言》云：「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亦見內篇，第三。

<sup>41</sup> 見《史通·序例》，內篇，第十。

<sup>42</sup> 見《史通·申左》，外篇，第五。

<sup>43</sup> 文見《隋書·經籍志》二，史部古史類之末。唐·魏徵等修：《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959。

<sup>44</sup> 雷家驥先生《中古史學觀念史》論此甚詳，見第九章，第二節。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頁459-462。

<sup>45</sup> 語出桓譚《新論》。唯《新論》已佚，此條見《文選》李善注江淹詩引。



見的遺文，似乎如此。其內容據〈束皙傳〉的描述，是「諸國卜夢妖怪相書」，已見前引。李劍國先生謂妖怪指反常之妖異現象，相書指占視吉凶之書，則《瑣語》就是記預言、占夢、妖異等以辨吉凶的書。<sup>46</sup> 這麼說來，無論從形式或內容言，它都甚類後來的志怪小說。故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直言《瑣語》就是「古今紀異之祖」、「古今小說之祖」。<sup>47</sup> 其書的體制疑或依國別收錄，故曰「諸國」云云。這樣的設計其實有類《國語》、《國策》，頗有戰國史籍的特色，並不同於後來志怪之流。《史通·六家》篇曾言：「《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又言：「《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惑經〉篇亦言：「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疑當作晉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sup>48</sup> 可見《瑣語》或又依時序分國記事，更可能即以晉為主（正如《春秋》以魯為主分記諸國事），而有〈夏殷春秋〉、〈晉春秋〉諸目。〈惑經〉篇另條又云：

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sup>4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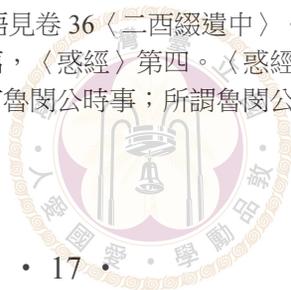
這裡劉知幾更盛稱《瑣語》及《紀年》記晉事無所隱諱，勝過《春秋》。此固是《瑣語》等書的長處，獨怪《瑣語》的內容與《紀年》應有一定區隔，何以在劉知幾筆下幾度言及，更無分辨呢？或許《瑣語》雖屬雜史而記事排比有序，仍然近似史書的規格。可惜以上的推論皆已無法確證。劉氏推重汲冢書，〈申左〉篇自注曾言：「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

<sup>46</sup> 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章，頁87。按，汲冢另有專記卜筮故事之《師春》一書，與《瑣語》取材雖殊，性質則似。

<sup>47</sup> 前語見卷29〈九流緒論下〉；後語見卷36〈二酉綴遺中〉。

<sup>48</sup> 分見內篇，〈六家〉第一；又外篇，〈惑經〉第四。〈惑經〉蓋謂《春秋》在閔公以前未有晉事，而《瑣語》則已有魯閔公時事；所謂魯閔公時事，實即〈六家〉所謂晉獻公十七年事。別詳下文。

<sup>49</sup> 同上註。



但〈雜說上〉篇又云：

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sup>50</sup>

此條則涉及《瑣語》與《左傳》二書之異，並且知幾以《瑣語》為是而《左傳》為非。黃熊入門見昭公七年《左傳》，赤熊窺屏另見《御覽》卷九〇八獸部引《瑣語》。子產既解晉平公之夢為共工之卿作祟，病而無傷，則事涉妖異吉凶，見收《瑣語》完全合理；《左傳》雖亦言子產解夢，富有迷信意味，而記載相對平實。茲將兩者列下。《瑣語》曰：

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顛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為天王祟。見之堂上則止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近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於顛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左傳》則曰：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郊祭），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兩相比較，顯然劉知幾的評價有欠公允。不過此條的存在倒可以讓後人明白，《瑣語》與史書的差別究在哪裡。史書雖也間載怪異，卻相對平實，且以記史為主；《瑣語》雖或披著史書的外衣，卻誇張妖異，且以妖異為主。

如果吾人對《瑣語》的來歷與性質能有一定的掌握，則或許今已失傳的《瑣語》的某些內容仍然可以推測一二。就以劉知幾所提到的為例，他說《瑣語》「載魯國閔公時事甚詳」，又說「記晉獻公十七年事」，已見前文；考之《左

<sup>50</sup> 前條見外篇，〈申左〉第五。此條亦見外篇，第七。

傳》，魯閔公在位僅二年，其第二年就是晉獻公之十七年；這二年中各國的確發生了幾樁卜夢妖怪預言吉凶的大事，很可能會被《瑣語》所引納。魯閔公元年之前夕，即晉獻公十五年秋，魯莊公死，子般立，旋為慶父所殺；閔公立，成季奔陳。與此同時，忽有神降于莘，居莘六月。於是周惠王問內史過，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過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王又問今當如何？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某日用某物）。」王從之。於時虢公亦享神，請賜土田；史嚚聞之，曰：「虢其亡乎！……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左傳》的記載不過如此。但此事另有更聳動的記錄，可參看《國語·周語上》：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有布福焉。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今虢少荒。其亡乎！……不過五年。」……十九年，晉取虢。<sup>51</sup>

與上述赤熊黃熊的故事一樣，當時傳說顯然有比《左傳》所言更為妖異的內容，甚可能為《瑣語》所採取，為劉知幾所親閱。又，魯閔公元年，晉獻公十六年，晉作二軍，使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以耿賜趙夙，以魏賜畢萬。士蔦嘆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卜偃亦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或作巍），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魯閔公二年，晉獻公十七年，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

<sup>51</sup> 見清·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8-31。

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今命以時卒（十二月），闕其事也；衣之衺服（偏衣），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衺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即使《左傳》的記載尚簡，也頗可看出晉獻公對太子申生的惡意，以及整體氛圍對申生的不利。再參《國語·晉語一》，則彼文詳細鋪陳了驪姬謀害申生之事，即對所謂「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也連續記載了僕人贊、里克、先友、狐突的解讀；且看僕人贊的說法：

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示之以堅忍之權（二句謂偏衣、金玦），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sup>52</sup>

的確，這些故事中，有奇有怪有先見有預言，顯然亦十分符合《瑣語》的選錄原則。故劉知幾特別點出的《瑣語》「記晉獻公十七年事」，捨此尚有何事！按：上述討論的目的，並非只要為《瑣語》添加一些可能的內容而已。總體而言，《瑣語》摘記春秋奇怪事雖「多與《左氏》同」，總比《左氏》更誇張迷信，大概是合理的推斷。〈疑古〉篇中，劉知幾謂世人對《紀年》亦多不信，已見前文。《瑣語》在當代的命運可能不會更好。然從上文所述看來，劉知幾雖不喜雜述短書之類，他自己對《瑣語》的觀感倒是不錯的。

至此又牽連出另外一個問題，即晉魏的編年史《紀年》中是否也會有若干特異的記事，並且與《瑣語》重疊？答案應該是肯定的。《紀年》後半記晉魏事，《瑣語》後半似亦以晉事為主，<sup>53</sup> 則雙方勢必會有所交疊。例如前述「舜放堯於平陽」一事，《史通·疑古》兩引之，一云出《汲冢瑣語》，一云出《汲冢書》，指《紀年》，<sup>54</sup> 或即兩書俱載。又「太甲殺伊尹」事，仲王崩，伊尹

<sup>52</sup> 同上註，〈晉語一〉，頁 262-270。

<sup>53</sup> 今所見《瑣語》遺文中，晉事所佔條文特多。故《史通·雜說上》亦已謂《汲冢瑣語》或即晉乘之流。劉知幾列舉諸故事，幾乎全屬晉事。

<sup>54</sup> 此依上下文而知。參看方詩銘：《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同註 18，頁 67。

放太甲而自立，終被殺，因與舊傳大異，故《紀年》此條屢見昔賢引錄；<sup>55</sup>而《瑣語》亦有幾乎全同的記載：「仲王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見《御覽》卷八三皇王部引。此所以清·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集說》謂：

《瑣語》、《紀年》二書互相出入。<sup>56</sup>

他認為出入的原因是：「當時簡編散亂，輒以其言之相似者附入之。」這自然也是合理的推想，卻未考慮到兩者之間可能的交集。既如是，則吾人不由得想像猜測《紀年》中某些妖異的記事是否亦有可能出現於《瑣語》之中；例如：

宣王時，烏（當作馬）化為狐。<sup>57</sup>（《御覽》卷九〇九獸部引《書紀年》）

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焉，玉化為蜮射人。

（《御覽》卷九五〇蟲豸部引《書紀年》）

周隱王二年，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御覽》卷八八〇咎徵部引《紀年》）

梁惠成王七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同上）

《紀年》這些故事，都屬於「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sup>58</sup>之類，故《御覽》納之於獸部、蟲豸部、咎徵部、妖異部，應該都頗合乎《瑣語》的取錄趣味。唯以今日所見的其他《瑣語》遺文為參照來看，《紀年》顯然記事甚短，即事而止；《瑣語》則多半記事較長，往往交代前因後果，且有對話；彼此體製不同。假使這些傳說故事附有更多的前後鋪陳，自有可能為《瑣語》所收錄。按：上述討論的目的，也並非只想為《瑣語》添加若干可能的內容而已。釐清《紀年》、《瑣語》二書互相出入的問題，並在比較中更加理解《瑣語》的取向性，

<sup>55</sup> 〈杜序〉、〈束傳〉、《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孔氏正義、《文選·豪士賦》李注、《史通·疑古》、《史通·雜說》等俱引之。詳見方詩銘《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同上註，頁23-25。

<sup>56</sup> 參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335，頁15上。

<sup>57</sup> 此條亦見《御覽》卷八八七妖異部引《紀年》。文作：「周宣王時，馬化為狐。」尚有其他引例可證，茲不詳舉。

<sup>58</sup> 語出《左傳》宣公十五年。



方是本段的目的。

今日所見《古本竹書紀年》中涉於妖異的記載尚多，並不止上述數條。但上述故事正有一共同之點，即三者都被晉人干寶搜輯於其《搜神記》之中。《搜神記》是晉世最著名的志怪小說，干寶是深受汲冢《紀年》影響的晉世重要史官，已見前文。由於魏晉以來思想解放，道、佛大興的背景，志怪之作大盛，所謂「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教，故多因果之談。」<sup>59</sup> 干寶亦好尚神怪，成《搜神記》三十卷，被稱為「鬼之董狐」。<sup>60</sup> 其進《搜神記》之奏表云：

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sup>61</sup>

所謂「古今怪異非常之事」，當然可以括入《紀年》、《瑣語》之事。所謂「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則顯示出古今傳說的散碎及分異出入。干寶所取諸文或長或短，未知是否即其本來面目。《搜神記》今存二十卷，已是明人綴輯所成，然而仍可推見其書應有〈妖怪〉篇，<sup>62</sup> 今列為卷六。上述《紀年》馬化狐、玉化蠅、地暴長三事，果然今皆收在卷六，即〈妖怪〉篇。雖然目前已無法考得〈妖怪〉篇中尚有何事出於《瑣語》，然於理必當有之。單從干寶奏表及〈妖怪〉篇名來看，《瑣語》記卜夢妖怪占相之事的取向，可謂正趕上了魏晉的新流行，理應不會被輕易忽略。而談到這新流行，恐怕吾人還得反思：汲冢《瑣語》出土的刺激與當世志怪小說的大盛也必定是脫不了干係的。本段所言並非全出推測，因為今日所見區區一、二十條《瑣語》遺文<sup>63</sup> 中，就有被《搜神記》

<sup>59</sup> 明·胡應麟調：「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教，故多因果之談。」見氏著：《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局，2001年），卷29，〈九流緒論下〉。

<sup>60</sup> 見《世說新語·排調》。

<sup>61</sup> 見唐·徐堅等撰：《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21引「干寶表曰」。

<sup>62</sup> 唐《法苑珠林》有「妖怪」目，篇首即引「干寶記」云：「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其於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云云。前賢據此認為《搜神記》應有〈妖怪〉篇。

<sup>63</sup>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所輯《汲冢瑣語》共二十五條，其中尚有不當計入者。

收錄的實例。文見《搜神記》卷八：

宋大夫刑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sup>64</sup>

此故事的首尾已有記錄者修飾說明的痕迹，但其主體部分不見於任何先秦古書，僅見於《瑣語》，曰：

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從今已往五月五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巳，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至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之。求得，已蟲矣。（《御覽》卷九七八菜茹部引《古文瑣語》）

雖然細節或經改動，刑史子臣預言的精準分明正是《瑣語》的典型內容，而《瑣語》直接影響了《搜神記》的題材內容至此也已信而有徵。

除了《搜神記》，其他志怪小說如西晉王浮《神異記》等也曾取資於《瑣語》。《瑣語》另條曰：

晉冶氏女徒病，棄之。舞囂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徒曰：「吾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當以告舞。」僮（告字當在此）舞囂，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答曰：「既棄之矣，猶未死乎？」舞囂曰：「未。」遂買之。至舞囂氏而疾有間，而生荀林父。（原注：「《神異記》又載之。」）（《御覽》卷六四二刑法部引《瑣語》）

荀林父為晉文公時名卿。此條故事記其出生的傳奇與夢占，亦是《瑣語》的典型內容。而王浮《神異記》採錄其事，正可視為汲冢出書的後續影響。《神異記》今已亡佚，本條賴《御覽》注出。

又，《瑣語》中的另一故事，記齊景公伐宋，夢二人甚怒；晏子告以短

<sup>64</sup> 下文尚有：「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數語，顯是記錄者補充，暫且從略。

者是伊尹，白者是盤庚，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文見《御覽》卷三七七、三七八人事部引《瑣語》及《古文瑣語》；文長不錄。晉張華《博物志》分明亦有雷同的故事：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二人怒。公謂太公之神，晏子謂宋柏（當作祖）湯與伊尹也。為言其狀，湯皙容多髮，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怒散軍伐宋。<sup>65</sup>

兩者的主要元素都是夢占，唯相異之處稍多，是否一定取材於《瑣語》尚不敢必。無論如何，《瑣語》作為「古今紀異之祖」，它與晉世盛行的志怪小說之間具有深厚的傳承關係，應是不爭的事實。

最後尚可就「瑣語」名目與性質作些討論。本節最初已言，「瑣語」指瑣小語事，或相當於「叢殘小語」。由《晉書·束皙傳》看來，《瑣語》書名應是先秦舊題。廖群先生認為由題名與內容均可證明先秦確有以講述故事為旨歸的「說體」之存在，<sup>66</sup>或是。《隋書·經籍志》將《紀年》列在「古史」類，《汲冢瑣語》列在「雜史」類，《穆天子傳》列在「起居注」類，均視為史書之一種。劉知幾《史通》在〈雜述〉篇<sup>67</sup>論列史流之雜著十種，他將《世說》、《語林》、《語錄》、《談藪》等列在「瑣言」類，《搜神》、《幽明》、《志怪》、《異苑》等列在「雜記」類，而將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等列在「逸事」類。這說明他已有明確的志人、志怪概念，卻沒有涉及《瑣語》，又把顧協《瑣語》者流視作「逸事」。可知在昔人的認知之中，《瑣語》還是具有歷史性質的「雜史」、「逸事」。由前節的討論看來，《瑣語》似乎仍依託在歷史的架構裡，則如此認知並無不妥。明代以後，胡應麟等始將《瑣語》視為小說，已見前文。雖說胡氏觀念已有進步，這或許與《瑣語》遺佚已多、架構不存亦有關。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則

<sup>65</sup> 見卷7，〈異聞〉。

<sup>66</sup> 書名多有說、傳、語等字樣。見廖群：〈汲冢瑣語與先秦說體考察〉，《理論月刊》2012年第4期（2012年4月），頁113-117。

<sup>67</sup> 分見《隋志》，卷28，經籍二。又《史通》，內篇，第三十四。



進一步又將《穆天子傳》亦視為小說家言了。李劍國先生將《瑣語》判定為一種「雜史體志怪」，<sup>68</sup> 最切。六朝之時《瑣語》這類的書名尚兩度出現，一是所謂漢·東方朔《瑣語》，一是上述梁·顧協《瑣語》。前者恐是晉以後人託名，今存一條；<sup>69</sup> 後者全佚。兩書能不能算是受到汲冢《瑣語》影響而仿作的同類之書，已難確說。

#### 四、《穆天子傳》出世與古神話傳說的鉤稽轉化

最後論《穆天子傳》。《穆天子傳》至今傳世，<sup>70</sup> 晉世著名學者郭璞所作的注亦全部傳世，在汲冢文獻中可謂最為幸運。或許這跟它形式與內容的整全性與趣味性都有關係。《晉書·束皙傳》云：

《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

此即其主要的敘事內容。不過今傳郭注本都有六卷，第六卷記周穆王美人盛姬在隨王東巡河濟時受風寒而亡，王為之舉辦隆重的喪禮；則本卷原即束皙所提到的雜書十九篇之一《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移入《穆天子傳》中可能即荀勗等人當初整理時所為。<sup>71</sup> 據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引晉·王隱《晉書·束皙傳》，《穆天子傳》原名似是《周王游行》，已見前文；而荀勗領銜之〈上穆天子傳序〉分明已用《穆天子傳》之名；則今名可能亦是荀勗所改。<sup>72</sup>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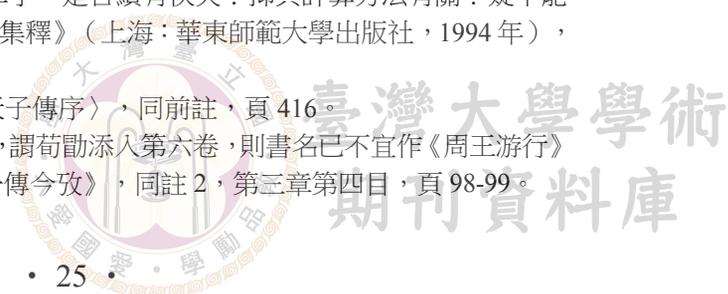
<sup>68</sup> 見《唐前志怪小說史》，同註 46，頁 91。

<sup>69</sup> 東方朔博聞好異，雜史小說往往託名於朔。東晉·嵇含有《南方草木狀》一書，見收《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62年）四編一冊，卷中「抱香履」條即引「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云云。

<sup>70</sup>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本書共八千五百一十四字，然清·洪頤煊〈校正穆天子傳序〉云今本僅六千六百一十二字。是否續有佚失？抑與計算方法有關？疑不能明。參看王貽樑：《穆天子傳匯校集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整理前言〉，頁 21-22。

<sup>71</sup> 洪頤煊已有此說，見其〈校正穆天子傳序〉，同前註，頁 416。

<sup>72</sup> 衛挺生引朱希祖《汲冢書考》之說，謂荀勗添入第六卷，則書名已不宜作《周王游行》矣，遂改之。見衛挺生：《穆天子傳今攷》，同註 2，第三章第四目，頁 98-99。



所謂「見帝臺、西王母」，今本已無帝臺事，或亦續有佚失。<sup>73</sup>此〈上穆天子傳序〉見於某些舊抄本之首，頗為珍貴，但結銜五行中文句頗有些費解處，如下：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勛  
 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言部」二字，疑誤）  
 秘書主書令史譴勳給（三字似是人名，疑有誤字）  
 秘書校書郎中張宙  
 郎中傅瓚 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謹並第錄

無論如何後人至少可知在荀、和之外參與校錄其書者尚有張宙、傅瓚等人。張宙諸史闕載，傅瓚疑即注釋《漢書》的「臣瓚」，已見前文。此序前半談及竹簡的規格與汲冢的年代，暫不予討論；後半談及《穆天子傳》的內容大要，云：

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狩，得盜驪、綠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sup>74</sup>

這是說其書所載周穆王巡遊之事與《左傳》、《史記》相通。但全書幾乎是以日記起居注的形式寫成，又有許多奇物異族等內容，實已遠遠超過了傳統古書的軌範，所以又說「其言不典」。於是最末只能以「頗可觀覽」帶過，沒有檢討它價值的高低。

按：荀勗此序是《穆天子傳》問世後劈頭第一篇介紹，卻已完全掌握了要領。當時人看《穆傳》，一方面意圖將之與既有的歷史知識連繫起來，一方面也試圖從神話傳說的角​​度探索它的淵源。前者表現為查找《左傳》、《史記》

<sup>73</sup> 衛挺生又謂自陽紆至河首襄山之一段，以及自襄山而至歎鳥之山之一段，缺路途遊行紀事；卷3「乙巳諸飢獻酒」至卷4「庚辰至於滔水」之間，缺數月乃至半年之紀事。見《穆天子傳今攷》，同註2，第二章第五節，頁85。

<sup>74</sup> 亦見王貽樑：《穆天子傳匯校集釋》，同註70，頁1。

等書中的周穆王事迹，後者表現為參比《山海經》等書中的西王母故事。周穆王是西周文、武、成、康、昭王後繼位的周王，因〈書序〉有「王享國百年耄荒」一語，故《史記·周本紀》逆推而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未免過於高年。及《紀年》出土，束皙等始知「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已見前文。《史記》凡三及穆王事，〈周本紀〉云：「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sup>75</sup>〈秦本紀〉亦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即穆）王，得驥、溫驪、驊駟、騶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sup>76</sup>〈趙世家〉仍有類似的記載，曰：「造父幸於周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sup>77</sup>可知遠在《穆天子傳》出土之前，史遷亦已得聞周穆王因造父御名馬而西征或西巡狩見西王母的故事原型。更早的史籍如《左傳》昭公十二年，亦記楚右尹子革勸諫楚子勿伐徐，謂：「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sup>78</sup>這裡記周穆王車轍馬迹周行天下，較史遷更為明確，難怪荀勗要將之引入〈上穆天子傳序〉裡。唯荀勗序文所說的「北絕流沙，西登崑崙」云云，《左傳》、《史記》皆未提起。倒是與《穆天子傳》同時出土的戰國古《紀年》中，對此有清晰的描述：

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山海經》郭注引《竹書》）

穆王十二年，西征，至於青鳥之所解。（《御覽》卷九二七羽族部引《紀年》）

<sup>75</sup> 〈周本紀〉，卷4，頁136-137。

<sup>76</sup> 〈秦本紀〉，卷5，頁157。

<sup>77</sup> 〈趙世家〉，卷43，頁1779。

<sup>78</sup> 見昭公十二年傳，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冊4，頁1341。



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宮。（《穆天子傳》郭注引《紀年》）

這樣看來，周穆王確實像是一位喜好巡遊之君，而他的事蹟如此豐富多采，也是早有淵源傳承的。屈原《天問》有句：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所言亦是穆王周流天下事。

至於出自先秦的《山海經》，雖非史籍而多怪異的地理博物神話傳說，卻也屢次慎重提到居於西方的西王母；如〈西次三經〉：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sup>79</sup>

又如〈大荒西經〉：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sup>80</sup>

又如〈海內北經〉：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sup>8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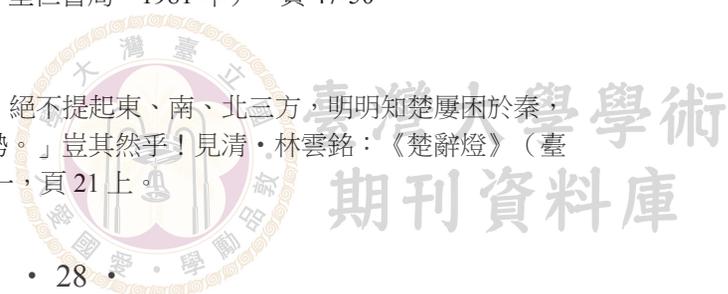
此西王母的形象身分雖與《穆天子傳》大不相同，諸所居處仍然可以作為研究《穆天子傳》的重要參據。屈原未知是否曾接觸過這些神話故事，〈離騷〉篇末虛託去國遠遊，也是一意向西，<sup>82</sup>所謂「邇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

<sup>79</sup> 見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47-50。

<sup>80</sup> 同上註，頁407。

<sup>81</sup> 同上註，頁306。

<sup>82</sup> 《楚辭燈》謂：「止在西方一面，絕不提東、南、北三方，明明知楚屢困於秦，將來必為秦併，故特取道以觀形勢。」豈其然乎！見清·林雲銘：《楚辭燈》（臺北：廣文書局，1963年），卷之一，頁21上。



予。……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這裡有「西皇」而無「西王母」，但其地理概念也頗與《山經》、《穆傳》相通。

至此就應提到提倡汲冢竹書最熱切的學者郭璞。郭璞既注《穆傳》，又注《山經》，今皆存世，還注過《爾雅》、《方言》等。他常以這些書互證，又或加上《紀年》資料，使彼此俱能通解。這不但可見一個訓詁家的高明手段，也使汲冢文獻的價值得到很好的發揮。譬如他注〈西次三經〉那一段的西王母故事，即將《穆傳》卷三「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直至「眉曰：西王母之山」整段錄下以為注。又如注〈大荒西經〉那一段，他先引《河圖玉版》謂西王母居崑崙之山，又引〈西山經〉（即〈西次三經〉）稱西王母居玉山，又引《穆傳》天子紀名迹于弇山之右以為西王母之山，而綜結曰：「然則西王母雖居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窟游息之處，不專住一山也。」可謂巧於貫串成說。又如〈大荒北經〉云：「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sup>83</sup>郭注先引《穆傳》（卷四）曰：「北至曠原之野，飛鳥所解其羽。乃於此獵鳥獸，絕羣，載羽百車。」再引《竹書》（即《紀年》）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蓋即以二者注此大澤。他注《穆天子傳》，亦時時引《山海經》輔助說明，例如卷一「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郭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這就貫串了不同的名目。又如卷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郭注：「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這就充實了《穆傳》地理。更有意思的是，郭璞〈注山海經敘〉仍然存世，由此文可以看到一些微妙的訊息：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闕誕迂夸，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案汲冢《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穆王駕八駿之

<sup>83</sup> 見袁珂：《山海經校注》，同註 79，頁 424。

乘，……萬里長驚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窮極歡娛，然後旋歸。……若竹書不潛出于千載以作徵于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sup>84</sup>

這裡顯示出世人多不信《山海經》，郭璞則自認「至通」，思破「羣惑」，提倡莊生所說的「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那麼汲冢出土的幾種竹書在他看來就是非常堅實可靠的文獻，兩相對照，完全可以正面提升《山海經》的可信度，故謂：「若竹書不潛出于千載以作徵於今日，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此下《山海經》的地位似乎確有所振起，參下文。當時人士對《穆傳》等書的態度究竟如何已不易確指，但懷疑西王母傳說的人原本一直都有；史遷在〈趙世家〉中非常含蓄地觸及周穆王西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云云，即遭晉散騎常侍譙周《古史考》否定抨擊，見唐·司馬貞《索隱》引述：

《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見乎？」<sup>85</sup>

譙周不及見《穆傳》，未知若真見《穆傳》是否會改變他的態度。晉司馬彪及見《紀年》等書，遂條一百二十二事駁周，已見前文。司馬彪顯然也同司馬貞一樣，是以竹書為信的。〈隋志〉著錄《穆傳》於史部起居注類，小序云：

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

是中古學界還有以《穆傳》為周內史所作起居注的說法，則這些記載的真確性還能懷疑嗎？疑信之間，一般讀書人則頗樂於以《穆傳》與《山經》作為博聞好異之資，樂於耽讀；故晉末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之一已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之三又云：「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它如

<sup>84</sup> 見袁珂《山海經校注》之〈附錄〉，同上註，頁478-480。

<sup>85</sup> 同註77，頁1780。



宋顏延年〈赭白馬賦〉亦云：「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齊江文通〈遂古篇〉亦云：「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寔兮。」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亦云：「夏后兩龍載驅璿台之上，穆滿（穆王名姬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都是把《山經》、《穆傳》牽合並說。又梁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亦用《穆傳》「七萃」之典。<sup>86</sup> 從這些詩文看來，應該說《穆傳》、《山經》無形間也拜六朝仙道思想盛行之賜，而成了相當流行的讀物。孔穎達謂「《穆天子傳》世間偏多」，其故在此。

其實《穆天子傳》的真正性質，既不是西周內史的實錄，也不是神話、仙話及無根傳說，而是一部依傍周穆王事，體似實錄、文多虛擬的歷史敘事小說。昔人讀此，多把目光集中在西王母故事上；近人讀此，多把目光集中在穆王西征地理上，<sup>87</sup> 都不免偏陷。還是北大馬振方教授所說最切要：

《穆天子傳》……是一部以周穆王巡游為題材、模擬編年史書體式的敘事文學作品。雖然粗略簡古，卻具有虛構性、夸誕性、人物形象意向化、結構蘊含凝聚力和藝術張力等多種小說品格，富于理想的浪漫色彩和大氣磅礴的史詩風貌，是我國小說的初生兒與開山祖。<sup>88</sup>

周穆王才是全書的主角，他形象飽滿而集中，巡游列邦，獻賜賓會，展現仁明天子的形象和盛世風華，成為擾亂的戰國時期的天開異想。故其書真正的價值，應當要從小說史上來談。由於上文已涉及一些《穆傳》性質問題，特稍作說明於此。本文暫不再討論這一問題。

若論《穆天子傳》出世對當代學術界的影響，恐怕還有三端可說。一是《列子》書的撰造。《列子》疑非先秦古籍而為晉人依託偽作，自宋末黃震《黃氏

<sup>86</sup> 諸詩文皆見《文選》。江淹詩見其集卷5。

<sup>87</sup> 請參看王天海：〈穆天子傳考略〉，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第4期，頁22-25。

<sup>88</sup> 見馬振方：〈大氣磅礴開山祖——穆天子傳的小說品格及小說史地位〉，《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0卷1期（2003年1月），頁83-87。

日鈔》以迄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等已論列不少。<sup>89</sup> 其中的〈周穆王篇〉與〈湯問篇〉，由於所謂漢劉向〈列子新書目錄〉中曾云：「〈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sup>90</sup> 因而受到更多的注目。〈周穆王篇〉「西域有化人來」之說與〈湯問篇〉「偃師造偶」及「火浣之布」諸說，經常成為其書不古的證例。今按：〈周穆王篇〉明白襲取《穆天子傳》的內容文句，應當也是其書不古的重要證明之一，並且是《穆傳》被晉人廣為運用流傳的一個鮮活的例據。化人與王神遊，「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驪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主車則造父為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漚以洗王之足；……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對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此非櫟括《穆傳》而何！故東晉張湛的注也說：

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

這卻不是兩事相合，根本是《列子》書抄襲《穆傳》。〈湯問篇〉也有類似的情形：「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進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偶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偶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這裡雖主要鋪陳來自佛經的機械人故事，<sup>91</sup> 卻託體於西巡狩回來的周穆王及其美人盛姬身

<sup>89</sup> 參見楊伯峻：〈辨偽文字輯略〉，《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90-294。

<sup>90</sup> 同上註，〈重要序論匯錄〉，頁278。姚際恆等並以為是文非真。

<sup>91</sup> 季羨林先生以為偃師之巧伎云云出自西晉初竺法護新譯出之《生經》卷3。亦可證明《列子》之晚出。參看〈列子與佛典〉一文，收於《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畔；張湛注亦云：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則其假託作偽之迹歷歷可見。清人王謨曾謂《穆傳》乃戰國時人依託《列子·周穆王》而作，非西周史官作；<sup>92</sup> 恐怕其說正好倒反了；應是晉人所偽《列子·周穆王》依託西晉初出世的《穆傳》而成篇。<sup>93</sup> 《穆傳》甚至影響到一部道家偽子書的構成，這種迴波餘瀾實在出人意表。

《穆傳》餘瀾可述者，還有流行當時的雜傳小說《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二書主要鋪述王母會漢武帝事，雖然滿紙仙道內容，其依仿原型卻應該就是周穆王會西王母事。《史記·趙世家》已含蓄說到周穆王會遇西王母，彼時《穆傳》、《紀年》尚未出世，史遷當然別有所據。意者這樣的傳說或許來自趙地，遠出戰國，與趙氏得氏的傳聞有關，<sup>94</sup> 似乎也因緣受有晚周神仙家言的影響。由於其事可喜可詫，類似的傳說愈傳愈多，愈傳愈早，甚至輾轉傳會為堯、舜、或禹會遇西王母<sup>95</sup> 等等。入漢之後，漢武帝求仙心切，營謀萬端，而終不成。結果這一人王與天上神仙遇合的奇情故事，不期然便轉移焦點到漢武帝身上。《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都是這樣的作品。《故事》所述尚簡，《內傳》對武帝見王母事已鋪衍出萬言的篇幅。《故事》內容尚包括武帝平生諸事，而王母來承華殿時，青鳥夾侍，頭戴七勝，仍有《山經》的遺影；<sup>96</sup> 《內

<sup>92</sup> 見〈鄭濂校穆天子傳後識〉。見王天海〈穆天子傳考略〉所引，同註 87。

<sup>93</sup> 陳文波、馬敘倫諸先生亦已言之。同註 89，頁 302、319。

<sup>94</sup> 〈趙世家〉云：穆王以趙城賜造父，由此為趙氏。趙氏盛於晉，晉獻公時伐霍賜耿之趙夙，即造父十二世孫。凡此恐皆是趙氏盛於戰國之後所造作之歷史傳承。詳見〈趙世家〉，同註 77。

<sup>95</sup> 賈誼《新書》之〈脩政語〉云：「堯西見王母。」《世本》云：「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荀子·大略》云：「禹學于西王國。」以上參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第三章，同註 46，頁 205。

<sup>96</sup> 原文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頁 55。其文字已經李氏輯校，與一般傳本不盡同。

傳》則充斥道教求仙論述，幾成宣教小說，<sup>97</sup> 王母的身分與造型亦已大幅改變。<sup>98</sup> 若論這些雜傳小說產出的年代，學者意見尚不一致，但大抵魏晉以還此類內容均已逐漸流傳。例如晉·潘岳〈西征賦〉云：「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游盤。長傲賓于柏谷，妻睹貌而供餐。」此所云與善注所引《漢武帝故事》內容脗合。又張華《博物志》某條云：「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當作白麕）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當作承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滿七刻，王母乘紫雲車，……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sup>99</sup> 此與今傳《漢武帝內傳》內容幾乎一致。郭璞〈遊仙詩〉第六首有句：「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sup>100</sup> 亦逕用《漢武帝內傳》中王母之語，善注亦已注出。凡此均為此類雜傳已盛行於晉世的顯證。推其原始，《穆天子傳》及相關戰國傳說共同提供的周穆王故事原型當然有不可掩抑的影響。也就是說，西晉汲冢《穆傳》的出世，當然會對這些傳說的更加盛行有推波助瀾之功的。

另外或可一提的還有東晉末義熙年間法顯西行求法所作的《法顯傳》一書。書或名《歷游天竺記傳》，見《歷代三寶記》，亦即〈隋志〉史部雜傳類所稱的《法顯傳》、《法顯行傳》，或地理類所稱的《佛國記》。<sup>101</sup> 書載法顯西行，發自長安，經河西走廊，踰葱嶺，進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印度，求法抄經，最後渡海經斯里蘭卡、印尼而返抵中國的全部事迹。途中一路記錄各國的國情、風土、物產、各種佛迹，並道里之遠近等。雖然未用干支

<sup>97</sup> 例如服食藥品及成仙等級，五嶽真形圖、及六甲靈飛等十二事的傳授。見李豐楙：《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第二章，頁26。

<sup>98</sup> 李劍國氏有分析，同註95，頁205-210。

<sup>99</sup> 同註65，卷8，〈史補〉。

<sup>100</sup> 上述潘賦、郭詩皆見《文選》。

<sup>101</sup> 《法顯傳》應為原署之書名。《水經注》屢引其書，皆稱《法顯傳》，酈道元之去法顯僅約一百年。



紀日，而恒用「從此東下五日行，到犍陀衛國」、「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剎尸羅」、「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的表述方式。這一西游故事細緻、完整而真實，規模頗似《穆天子傳》，亦有許多昔所未聞的異國奇聞；唯法顯所歸嚮的並非渺茫的西極神仙，而是立教傳法的佛祖與佛國；書中所透露的宗教熱忱，亦絕不讓侈陳仙道的《漢武帝內傳》專美於前。東晉以還雖漸有一些山水遊記的產生，未知對於法顯著書是否有促成的效果；反是西晉重新面世的《穆天子傳》一書帶來的新鮮感與震撼力，頗能讓吾人與《法顯傳》發生聯想。甚至兩者的書名也有微妙的相似性。此意從來未經人道，就讓讀其書者各自去意會罷！

## 五、餘語

本文儘量利用兩晉南朝及唐代史料，檢討汲冢發現中比較「整頓」、「明了」的三種古籍《紀年》、《瑣語》、《穆天子傳》出土後在當世學界所造成的波瀾與影響；至此粗可結束。尚可補充的是，除了上文已涉及的荀勗、和嶠、束皙、杜預、臣瓚、徐廣、樂資、司馬彪、干寶、王浮、張華、張宙、張湛、郭璞、陶淵明……等人外，晉世尚有不少學者曾經參與整理《竹書》的大業，亦不可沒；例如《晉書·王接傳》述：

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常侍潘滔謂接：……，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sup>102</sup>

發揚汲冢學的行列裡，由此又可加進衛恒、王庭堅、王接、摯虞、謝衡等人。又《晉書·續咸傳》述：

<sup>102</sup> 《晉書》，卷 51，頁 1435-1436。



續咸……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sup>103</sup> 續咸為杜預弟子，當然於《竹書》亦有強烈的熱情。所謂《汲冢古文釋》，證明續咸與衛恒一樣，亦長於科斗文的解讀。《遠遊》、《異物》等書名，也似乎與汲冢文獻有某種關係。至於其時考古學與古文字學的興起，或也與汲冢發現有關，限於篇幅，暫不再及。

（責任校對：方韻慈）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先秦·左丘明撰，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 晉·杜預撰：《春秋經傳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晉·張華撰：《博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1年。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 唐·房玄齡等修，清·吳士鑑、劉承幹注：《晉書斟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 唐·魏徵等修：《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sup>103</sup> 同上註，卷91，〈儒林〉，頁2355。



- 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唐·徐堅等撰：《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93年。
-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宋·趙明誠撰：《金石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宋·高似孫撰：《史略》，臺北：廣文書局，1991年。
- 明·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
- 清·林雲銘撰：《楚辭燈》，臺北：廣文書局，1963年。
- 清·何焯撰：《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清·臧庸撰：《拜經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 \*清·徐元誥撰：《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62年。

## 二、近人論著

- \*方詩銘：《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王天海：〈穆天子傳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第4期。
- \*王貽樑：《穆天子傳匯校集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
-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 李豐楙：《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
- 季羨林：《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 洪國樑：〈竹書紀年對兩晉南北朝學者之影響〉，韓國《中國學報》第30輯（1990年7月）。

- 馬振方：〈大氣磅礴開山祖——穆天子傳的小說品格及小說史地位〉，《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0卷1期（2003年1月）。
-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 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
-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廖群：〈汲冢瑣語與先秦說體考察〉，《理論月刊》2012年第4期（2012年4月）。
- 樊榮：〈汲冢學在黃河文明繼承創新中的地位〉，《殷都學刊》2012年第4期。
- \*衛挺生：《穆天子傳今攷》，臺北：中華學術院，1970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an, G. (1962). *Han shu [Book of Han]*.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 Du, Y. (1988). *Chun qiu jing zhuan ji ji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its commentaries with collected annot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Jin dynasty)
- Fang, Sh.-M. (2005). *Gu ben zhu shu ji nian ji zheng [Ancient version of the Bamboo annals with verific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Fang, X.-L., et al. (1970). *Jin shu jiao zhu [Book of Jin with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s]* (Wu Sh.-J. & Liu Ch.-G, Annot.). Taipei: Yee 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 Li, J.-G. (2005). *Tang qian zhi guai xiao shuo shi [A history of tales of the strange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 Liu, Zh.-J. (1993). *Shi tong tong shi [Generality of historiography with general explanations]* (Pu Q.-L., Annot.). Taipei: Le J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Si-Ma, Q. (1959). *Shi 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Wang, Y.-L. (1994). *Mu tian zi zhuan hui jiao ji shi [Tale of King Mu with collected collations and explanation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ei, T.-Sh. (1970). *Mu tian zi zhuan jin kao [A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the Tale of King Mu, Son of Heaven]*. Taipei: The China Academy.

Xu, Y.-G. (2002). *Guo yu ji jie [Discourses of the states with collected explanations]*.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